

传承中华文明 弘扬天府文化

特别策划

天府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元体』关系

天府文化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之国”为地域依托的区域文化,是巴蜀文化的核心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府文化在古蜀时期开始孕育,秦汉时期在传承古蜀文明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且随着政治上的统一与中华文明形成稳定的“元体”关系。天府文化的发展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特性。

先秦时期孕育

先秦时期,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之间存在联系,天府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在孕育时期的天府文化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间天然存在“元体”关系。

距今5000年左右,岷江上游的古蜀先民向成都平原迁徙、定居,并以成都为中心,建立古蜀王国,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上世纪末以来,通过考古学者对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包括宝墩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遗址、金沙文化遗址等,证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都是古蜀文明史上的闪耀明珠,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中,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是天府文化之根。考古发现,宝墩文化形成的过程,至少有家自3个方向人群的到来、聚聚与整合:本地土著居民、西北方向仰韶晚期或马家窑时期南来的人群、顺江而上的长江中下游人群。可见,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同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元”。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出土器物显示,两处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但也有显著的中原文化因素。学者认为,在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特殊的联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也指出“三星堆文化和其后兴盛起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三星堆和金沙两处遗址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也看到了各个区域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且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文化品牌塑造的核心就是厘清文化主体与文化主体之间的独特性、差异性并特色表现,其目的是找出文化发展的差异化位置,从而发掘出文化的独特之处。因此,天府文化品牌塑造,需要对其内涵持续跟进进行深入梳理和提炼,把握天府文化在传承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以文化主体性,塑造天府文化品牌和文化品牌。

在天府文化的语境下,主体性则体现为天府文化作为主体,在与历史传统、自然环境和其他地域文化等客体的互动中所展现出的独特性和能动性,其具体表现体现在地域标识的独特性、历史传承的深厚性、文化态度的包容性、创新创造的活力性、生活品质的安逸性等社会功能的多样性等多个方面。

地域标识的独特性。天府文化是植根于成都平原这片沃土,覆盖“天府之国”川内,辐射周边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特色极为鲜明。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到社会人文,天府文化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貌。例如,成都平原的肥沃土地和适宜气候孕育了丰富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内陆农业文明的释怀。这种地域特色不仅体现在天府文化的饮食习惯、建筑风格、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物质文化层面,更渗透至语言、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等精神文化层面,彰显天府人民的勤劳、智慧、坚韧等品质。如,四川方言的独特韵味、川菜的麻辣鲜香,以及成都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态度,都是天府文化地域标识的独特体现,展现了天府文化作为主体的独特性和辨识度。这种鲜明的地域性是不府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使其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分。

历史传承的深厚性。天府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连续的传承性。从古代的三星堆文明到金沙遗址,到近代的巴蜀文化、川剧艺术,再到现代成都市域文化,天府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这种传承性不仅体现在文化符号、艺术形式等外在表现上,更体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在精神层面。

文化态度的包容性。天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在与其他地域文化、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上,始终展示一种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历史上,成都平原是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不同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中,也保留了自身的独特性。这种开放包容不仅体现在对不同文化的接纳和融合上,更在于其内部文化在包容性。在现代社会,天府文化更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文化精华,不断推动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天府文化鼓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形成了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展现了其作为主体的广阔胸怀和深厚底蕴。

唐宋时期繁荣

唐初将成都作为巩固其对西南统治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强化在成都的行政建制,先后设立益州总管、益州道行台和益州大都督府。在王朝国家强大的政治推力下,成都发展迅速,获得“扬一益二”的盛名。宋代推动城市革命,不仅给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刺激了城市文化的发展,使天府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宋时期,蜀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中原文化和天府文化深层次、广范围的互动交流,将天府文化推向新的繁荣。天府文化在保留原有文化底色的同时,更多地吸纳其他地域文化因素,丰富中华文明。唐宋时期天府文化的鼎盛,让我们看到了地域“元”文化的“向心”发展,和中华文明之“体”文化的“外向”扩散,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唐宋时期,蜀地人才辈出,文风蔚然。唐宋时期,四川一共出现了1000余位作家。尤其是宋代,推动了“以文治国”,北宋政府的3次兴学运动,推动了四川教育的发展,成都府学规模之大,“举天下郡国所无有”。教育的发展,加上两宋时期西南文化的繁荣昌盛。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是西南文化与巴蜀文化共生共荣的内在理路。

唐宋时期,蜀地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伴随着商业的发展,都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此外,造纸业进步,四川成为全国造纸业的中心,文人蜀人创造的“薛涛笺”声名远播;成都雕版印刷“甲于天下”,成为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这些都彰显了天府文化的繁荣。

展望未来,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力、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成都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过程中,走向世界的天府文化,必将成为彰显中国气象、巴蜀魅力、成都精神的特质标识。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度重点项目《成都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1)(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以西南文化研究赋能文化强国建设

王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之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202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建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学习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西南文化”是指中国西南部川、滇、渝、桂、藏等省(市、自治区)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包括这一文化的意识形所创造的民俗习惯、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等精神财富。从《尚书·禹贡》的“九州”、《礼记》的“五方”、《史记》的“西南夷”等典籍记载,到三星堆、金沙等考古遗址的新发现,无不证实西南地区地理环境、历史、民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呈现出显著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性。

西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巴蜀文化发展的源泉和沃土,对深化巴蜀文化认知、推动巴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支撑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加强西南文化的阐释、传播与创新,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奋力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认识西南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西南文化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文化土壤,巴蜀文化是西南文化重要的文化符号;西南文化彰显出区域文化发展的共性,巴蜀文化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巴蜀文化与西南其他地区文化相互借鉴、一同发展,共同促进了西南文化的繁荣昌盛。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是西南文化与巴蜀文化共生共荣的内在理路。

第一,西南文化是巴蜀文化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源泉和沃土。这一关系体现在地理空间的涵盖与交融、历史进程的共同演进、文化特征的相互影响以及文化认同的共享与传承等多个方面。从地理空间上看,巴蜀地区是西南地区的核心组成,其文化特征和发展历程与西南文化紧密相连,并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巴蜀文化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区域,这一区域处于西南地理版图的中心位置,是西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历史进程中,巴蜀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同演进。如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经历大规模移民和开发,中原文化先进技术与文化,与土著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并从巴蜀传到整个西南地区。巴蜀文化植根于西南沃土,成为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这些都彰显了天府文化的繁荣。

第二,西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理念,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研究西南文化有助于展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撑。比如,古蜀治水文化中“因势利导”“顺应天时”的思想理念,与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西南各民族互助友爱、崇尚和谐的传统美德,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宝贵财富。此外,西南文化研究通过对历代巴蜀历史人物、思想精华、道德品质的深入挖掘,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思想源泉。

第三,西南文化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多元一体,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与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区,历史时期有巴、蜀、氏、羌、濮、濮、濮等多个族群在此生活,包含了居于这里的汉、彝、藏、苗、布依等30多个民族。西南文化研究通过对梳理历史交流交融的脉络,揭示了不同民族文化在西南土地上的和谐共生,彼此借鉴的生动图景,展现西南各民族亲如一家、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提供历史镜鉴。

第四,西南文化可以揭示出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西南文化研究通过探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形成机制,系统展现西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揭示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流交往,能够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从而展现出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深入研究西南文化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让世界文化通过以西南文化为窗口,更直观地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成都作为西南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与当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CLT20240925)(作者:四川旅游学院教授,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赓续西南历史文化基因

徐范琳

西南历史文化基因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

文化基因是指在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下,一定社会群体所形成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行为规范等文化元素在内在联系与传承,其潜移默化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空中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延续、传播与发展。

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承载地,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其历史文化基因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西南历史文化基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发生、发展、构成和变异的过程,是西南历史文化特征的核心要素,承载着信念习惯、价值追求、民族智慧和精神象征,是中国多元文化体系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历史文化基因涵盖了自然文化基因、民俗文化基因、少数民族文化基因、艺术文化基因、红色文化基因、宗教文化基因等,其传承、交流、传播、发展构成了西南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波澜壮阔的图景,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多元文化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案例。西南历史文化基因植根于西南民众的内心深处,积淀着西南民众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西南民众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传承发展中协调融合文化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形态,呈现出巨大的综合效应,对中国西南的发展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西南文化研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利于加深对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西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民族背景孕育了丰富多采的文化形态。悠久的历史造就了西南地区多元的文化景观,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宗教习俗、艺术形式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地域特色文化。同时,西南地区也是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汇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南文化还吸收南亚、东南亚等域外文化因子,西南文化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类型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二,西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理念,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研究西南文化有助于展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撑。比如,古蜀治水文化中“因势利导”“顺应天时”的思想理念,与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西南各民族互助友爱、崇尚和谐的传统美德,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宝贵财富。此外,西南文化研究通过对历代巴蜀历史人物、思想精华、道德品质的深入挖掘,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思想源泉。

第三,西南文化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多元一体,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与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区,历史时期有巴、蜀、氏、羌、濮、濮、濮等多个族群在此生活,包含了居于这里的汉、彝、藏、苗、布依等30多个民族。西南文化研究通过对梳理历史交流交融的脉络,揭示了不同民族文化在西南土地上的和谐共生,彼此借鉴的生动图景,展现西南各民族亲如一家、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提供历史镜鉴。

第四,西南文化可以揭示出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西南文化研究通过探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形成机制,系统展现西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揭示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流交往,能够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从而展现出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深入研究西南文化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让世界文化通过以西南文化为窗口,更直观地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成都作为西南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与当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CLT20240925)(作者:四川旅游学院教授,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秦汉魏晋时期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绝对的自然至上,人类的改造也不一定就会造成自然的衰败。这个道理,2000多年前的成都人就已深知。

秦汉魏晋时期,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设施的兴建让千里沃野实现了“水旱从人”。都江堰水利工程巨大的成功,让蜀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生态经验。都江堰的修建以现有山势和地形因势利导,又在长期观察和总结岷江水流客观规律后采取无坝引流,从而真正实现了“水旱”变“水利”,这充分体现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改造观。也就是说,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中多次提到“基因”“文化基因”的概念,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以“文化基因”为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指引。

城市高质量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城市建设重心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潜能与魅力,关键是培育丰厚城市优秀历史文化基因,以文化润泽“人民城市”,不断拓宽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为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成都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四川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世界文化名城,在新时代实践发展中,成都必须重视从文化视角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对实践的情感聚力、精神引领力和开拓创新力,赓续西南历史文化基因,高质量提升人民城市能级。

赓续西南历史文化基因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与特征。用西南文化基因赋能城市发展,以高质量的城市化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成都必将在赓续发展中华书与城市繁荣的道路上谱写篇章。

一要锚定站位,推动历史文化基因理念突破。把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纳入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道路的信念。立足新

时代、新要求,着眼新目标、新任务,梳理完善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的概念和内涵,树立世界眼光,科学认识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的延续和变化,加强对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的系统梳理、挖掘及阐发,清晰和提升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传承发展工程,制定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传承发展专项规划,增强城市文化建设相关规划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持续推动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体系的科学化、完善化。

二要倾情打造,激活历史文化基因“活血输氧”。深入挖掘西南历史文化基因赋予成都城市的特色魅力,在共建共创共享中凝聚涵养城市发展的动力。共情共鸣在成都城市规划打造更多大众化、质朴式、沉浸式的西南历史文化基因体验场景,助力推动成都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与世界级的文化旅游高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文旅、文博、文创、文商、文娱消费体验,更好地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并通过历史文化基因标识鲜明的主题雕塑、人文景观、标志性建筑和公共艺术品等,浓墨重彩彰显西南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韵味,优良的都市形象品质品位以及昂扬的城市精神。

三要生动诠释,点亮城市大美人文化传播窗。以文通心,更易沟通世界。用中国话语、中国形象,从更广阔域和更高层次上,扩大成都城市文化的全球交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打造更多精彩生动的西南历史文专题与成都城市宣传系列传播节目,通过感染度高、接受度高、吸引力高的历史文化基因转化,向世界阐释推介厚重、感时代、时尚感的中国西南成都,展现中国西南历史文化底蕴与魅力,让更多世界民众了解、感受和喜爱成都的历史文化,让西南文化和中国成都的形象在世界面前“活起来”“多起来”“热起来”“美起来”,指数级放大成都城市文化名城的影响力。

——课题来源: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度重点项目《西南历史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3)(作者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耕为代表的诗人在浪漫的文学生想中将全城满眼的繁花和华美的蜀锦联系起来,勾勒出春花似锦、锦似春花的“锦城忆”。后蜀皇帝孟昶过这浪漫的意境变成了现实。他曾经幽默搞笑于成都城墙上,九月间美蓉齐放,使成都成为繁花似锦的锦城。“锦城”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标识。

形成亲近自然的文化行为。文雅与自然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慢生活。与魏晋不同的是,平民也参与到这样的文化生活中。这一时期,成都城市繁荣,二月花市、八月桂市、十一月梅市,几乎月月皆有;从正月开始,以大江游江、小游江为代表的亲近自然的游赏习俗几乎月月都有,这些全民性的民俗活动给城市打下深深的印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烙印;在官方支持下,更是通过江滨祭祀行为,都江堰修造活动等去实践和强化尊崇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理念。

引入生态智慧的生产方式。正如从修建都江堰中获得生态认知,这一时期也重视引入并运用自然规律去解决生产活动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成都造纸业发达和锦江水质上佳形成的反差背后正是成都人生态智慧的有力证据。

隋唐之后,经过宋元易代、明清更替,居民成分和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民间习俗活动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在历史中。明清时期,由于人口下降后滋生,以林盘为主的糖居方式让人们在成都平原持续发展,生态文化在林盘文化中得以延续与传承。

——课题来源:2024年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西南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研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2)(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隋唐宋时期形成特色突出的生态文化体系

隋唐宋时期是成都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成都虽然面临工商业发展和城池垦地带来的生态系统失衡风险,但在继承前代生态文化智慧的基础上,人们将前人的生态认知发扬光大,有效地维持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并在经济发展同时,系统地形成了蜀人的生态文化体系。

充满生态美的文雅追求。融自然、工商业、生活为一体的美好园林生活熏陶着人们的身心。人们乐意慢慢用心去发现眼前的乐趣,也乐此不疲地去赞美自然,形成数不胜数的美学佳作,成为重要的生态文化载体。以李白、高

制图:姜蓉